

【闫红说红楼】

## 那个比黛玉更早的葬花人

□闫红

古人常伤感于春逝，相形之下，黛玉葬花，动静似乎大了点：她不知道从哪里弄了一套花锄、花帚和花囊，把落花扫了，装进花囊里，埋到大观园角落的花丘里。她觉得让花朵随土化了，是最好的收场。

这确实更彻底，更环保，问题在于，没有可操作性。

王熙凤说黛玉是风吹就会倒的“美人灯”；荣国府小厮兴儿也说，走她旁边都不敢大喘气，怕气大了，吹倒了林姑娘。这么个娇滴滴的林妹妹，能扛得起锄头吗？更不要说挖坑填土。她要是突然干这事，不会引起围观吗？没人去贾母那通风报信？贾母都不让她做针线活，这回倒不怕她闷了腰？

还有宝玉，黛玉低头栽个衣服，他都说“才吃了饭，这么空着头，一会儿又头疼了”，看黛玉挖地，不是应该叫小厮帮她弄吗？他的态度居然是赞成。后来俩人怄气，宝玉“看见许多凤仙、石榴等各色落花，锦重重地落了一地，因叹道：‘这是她心里生了气，也不收拾这花儿来了。待我送了去，明儿再问着她。’”他是要把那些花朵送到黛玉跟前，问她怎么不葬花了是吗？

仔细想一下，是不是有点违和？但我们也无法想象黛玉不葬花。是葬花，让黛玉成为黛玉，让我们和贾宝玉一样，从人群中将她识别出来。她不再是擦肩而过的诸多美丽多才的女孩子中的一个，我们终于能识别出相似的灵魂。

葬花之前，宝玉也是将黛玉放在心上的，但他对别的女孩子也不错啊。他对黛玉，只是更好一点而已，也没有本质差别。直到听黛玉念《葬花词》，才让他起了大的感触，“先不过点头感叹，次后听到‘依今葬花人笑痴，他年葬依知是谁’，‘一朝春尽红颜老，花落人亡两不知’，不觉倒山崩之上，怀里兜的落花撒了一地。”

悲伤比快乐更能让我们识别出同类。到这里，宝玉才确认，黛玉是他隐藏在这世间的同类。

人生而寂寞，解决寂寞的方式大不相同。贾宝玉天生是个“富贵闲人”，他有更多时间面对内心，但也很难说这完全是幸运的。没有杂事干扰，他就触到了那三个终极问题：他是谁，他从哪儿来，要到哪儿去。他曾梦到自己来到江南甄家，在甄家花红柳绿的丫鬟眼中，他是一个陌生人。人生是一场偶然，很难说你一定是谁，那么你依赖的关系和情爱就有了很大的不确定性。

更让人生出虚无感的是时间和空间的不确定性。宝玉早就了然，人是时间和空间交汇处的过客。你来到这里，遇到这些人；你离开这里，你和他

们的爱恋纠缠，就是一场梦幻泡影。眼下的执着没有意义，但你无法不执着，于是你生出一种痴念，希望用死亡将所爱恋的一切固定下来，因为唯有死亡不可摧毁。

宝玉这心思，跟袭人说过。他跟袭人说，是因为她有水一样的温柔，并不觉得她会懂。不懂有不懂的好，要是懂，又懂得不太多，说不定会很尴尬。至于黛玉，他也没怎么讲过，虽然他心里知道她是不一样的，但也没有认真确认过。听到《葬花词》的这一刻，就是那个确认的时刻。

“依今葬花人笑痴，他年葬依知是谁”，“一朝春尽红颜老，花落人亡两不知”。这两句让宝玉心中大恸的诗句，说的是生命里的渺茫感。葬花的人，别人都笑她痴，但她的恒定感恰恰来自于这痴，她痴固她在。

她的这种痴，会随生命一起消逝。葬她的人是谁？不可知。当我们想把握什么时，总会碰上这样的不可知。时间的铁蹄终会碾碎所有坚持，谁也无法赖在春天里。

黛玉葬花，可以视作一种行为艺术，是她与生命的对话。面对落花，宝玉的做法是丢到水里去，他只看到落花顺水漂走，觉得很美。只有黛玉才能看到，别人眼中的飘零之美，对于花朵却是难测的命运。她说：“你看这里的水干净，只一流出去，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混倒，仍旧把花糟塌了。那畸角上我有一个花冢，如今把它扫了，装在这绢袋里，拿土埋上，日久不过随土化了，岂不干净。”这说的是落花，也是自己。大观园里的水是干净的，流出去还不知道会怎样。最好是死在这个有爱有梦有青春有热情的地方，随土化了，才算得其所哉。和宝玉一样，她也是大爱这美好的世界了，爱到想通过死亡固定下来。爱到深处，不是孤独，是想死，就死在当下，死在灿烂的此刻。

这是宝玉听了会如此悲伤的原因。他悲伤，是因为听到另一个人哭出了他的心事。这也使得《红楼梦》里的爱情与其他古典文学里的爱情有本质区别。《西厢记》《牡丹亭》《墙头马上》里的爱情都产自陌生和稀缺。只有《红楼梦》里的爱情产自熟悉，熟悉到觉得对方都该是自己的了（宝玉觉得宝钗的胳膊长在黛玉身上还能有福得摸），还会因为对方的一句叹息在心中激起惊涛骇浪。《葬花词》就是黛玉心底的那一声叹息。

这就是葬花在书中的意义。是葬花使得《红楼梦》里的爱情有了前所未有的超越。不过，葬花也并非曹公的原创，他多少是参考了唐寅的逸事的。

《红楼梦》里有三处提到唐寅，一是贾雨村和冷子兴聊天，说了一堆兼具“正邪”两气的人，里面就有唐伯虎；

二是秦可卿屋里挂着唐伯虎的《海棠春睡图》；三是薛蟠提起他在哪里看到唐寅的春官画“画得着实好”——“春官画”大概是薛蟠唯一能懂的艺术形式了，但他还是把唐寅念成了“庚黄”。

貌似唐寅这个人不怎么着调，擅长描述情欲。但是俞平伯先生在《唐六如和林黛玉》一文里提出，唐寅还是比黛玉更早的那个悲伤的葬花人。

在《六如居士外集》卷二里有这样的记述：“唐子居桃花庵。轩前庭半亩，多种牡丹花，开时邀文征仲、祝枝山赋诗浮白其下，弥朝浹夕，有时大叫痛哭。至花落，遣小仆一一细拾，盛以锦囊，葬于药栏东畔，作落花诗送之。”唐寅在桃花庵种了很多牡丹，花开时邀来朋友，从早到晚地饮酒，有时会大叫痛哭。待到花落时，叫侍者一一收拾，放入锦囊中，葬在药栏东畔，再写落花诗送别。

这就对了嘛。唐寅缺乏锻炼的身子骨，估计也干不了重活，叫小厮挖坑是不是就一点都不违和了？他负责哭就可以了。

他的哭和葬花，也是一种行为艺术，类似于阮籍的“时率意独驾，不由径路，车迹所穷，辄恸哭而反”——不看地图，不由路径，自己驾着个车子，走到路的尽头，恸哭返回。听上去好像挺分裂，阮籍不过是通过这种方式，表达对自由的极致追求以及终归要被拦截的挫败感。

不是只有作诗才能表达内心的激越，那些看似不可理喻的即兴的行为，同样可以彰显自我，唤起共鸣。阮籍千载之下犹有知己，黛玉葬花，宝玉的恸哭，是一场心魂合一的合作，也是对唐寅昔日葬花的呼应。在这个世上，你那些看似荒诞的行为，总有人懂。

在古代，这种遥遥致敬很常见。曹操《短歌行》里的“青青子衿悠悠我心”就借鉴了《诗经》里的《鹿鸣》；崔护有“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”；晏殊有“人面不知何处，绿波依旧东流”。那么对黛玉葬花这种情节上的脱胎换骨，也就不太奇责。

它甚至可以视为一个暗示，解读黛玉宝玉这样的人，可以到唐寅那里借一副钥匙。事实上作者一早就有了结论，借贾雨村之口，将贾宝玉和唐寅归为一类：“其聪俊灵秀之气，则在百万人之上；其乖僻邪谬、不近人情之态，又在百万人之下。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，则为情痴情种；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，则为逸士高人；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，断不能为走卒健仆，甘遭庸人驱制驾驭，必为奇优名倡。”

唐伯虎像一座桥，让桥那边的黛玉，和桥这边的宝玉，走到了一起。

（本文作者为安徽文学院签约作家。）

□施崇伟

“国际劳动节”与苏东坡并无关系，偏偏我在此时想起了苏东坡。想起的，不仅是他的诗文，还有他一生除写诗作画、爱民致仕之外的劳动故事。

苏轼幼年时，深得母亲程夫人悉心管教。程夫人除了教导孩子勤勉读书外，还教他种树、爱鸟，做力所能及的农活。苏家宅院有一片幽谧的竹林，“林断山明竹隐墙，乱蝉衰草小池塘”，这里，便是少年苏轼最早的劳动课堂。

“苏堤春晓”是杭州西湖胜景。今日漫步荷塘柳堤，切不可忘记当年苏轼之功。身为杭州副市长，为整治西湖，他不仅仅是搞调研、作方案和发号施令，还亲切带领身边工作人员和弟子挽起袖子加油干。他们挖沟、清淤、修补井壁，使得相国井水溢出井坎，向南流入漕河；疏通涌金池；在上池门外设置两道闸门，一道闸门连接池内将河水引入，另一道闸门以五根竹管引出池水，汇入河水流向东边，进入南井。

苏轼仕途多遇不顺，且不说接二连三的政治斗争，单是遇到的天灾之患也是一起接着一起，然而这些都被“劳动者”苏东坡的身体力行一一化解。初仕凤翔府判官，便遇陕西旱情，他几上太白峰，带领百姓到道观求雨；密州遇蝗灾，他亲临田间地头，带领百姓用“秉畀炎火”之法和“荷锄散掘”之术，火烧、深埋，消灭蝗害，终至“蝗不复生矣”；斗徐州水患，他先是冒雨踏泥泞到禁军驻地求援：“河将害城，事急矣！虽禁军，且为我尽力！”再亲荷畚鍤，布衣草屨，“庐于城上，过家不入”。

最显其劳动本色的，必是黄州。苏轼被贬至黄州后，好在二十年来一直追随他南来北去的好友马梦得，给他筹集到几十亩蒿草丛生、荆棘遍地的荒地，让他春耕秋种，过上了自给自足的农夫生活。母亲从小的劳动教育在此派上了大用场，他以苦为乐，脱去长袍，摘去方巾，一身农夫打扮，带着两个儿子，躬耕陇亩，挥汗如雨，自力更生。他给友人写诗：“去年东坡拾瓦砾，自种黄桑三百尺。”他给友人致信：“某现在东坡种稻，劳苦之中亦自有其乐。有屋五间，果菜十数畦，桑百余本。身耕妻蚕，聊以卒岁也。”这段时光，会种地，会造屋，会做东坡肉的苏轼，以“东坡”之名，用劳动的方式，走出了人生最繁华的风景。

少时的劳动教育，逆境中的劳动历练，有了这套本事的苏东坡，即使到了更加艰苦的岭南、澹州，也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了。在惠州，一边再治西湖，一边“日啖荔枝三百颗”；在澹州，他和乡野农夫开荒种地，自建茅屋三间聊以栖身，却命之以浪漫之名“桄榔庵”。至此，风雅之至，风趣之至，旷达之至。劳动者东坡，天下无敌。他把自己的生活态度概括为一句话，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，赢得了后世的共鸣。

苏东坡告诉我们：劳动是生命的一种需要。劳动的过程，也是修行的过程。当我们把工作与劳动看成是修行，锄两分地，种一园菜，流一通汗，便可获得生命里有滋有味的“清欢”。（本文作者为国企员工、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通俗文学研究会会员。）

【五月赞歌】

劳动节里读东坡